

《伤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伦理的转型

周建华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虽早已远去,但其影响却远未消逝。《伤痕》是伤痕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它的影响意义深远。《伤痕》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伤痕”描述,而在于它所开创的叙事伦理。《伤痕》叙述了王晓华在组织与母亲之间的艰难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精神创伤,这个精神创伤通过对王晓华个人生活的娓娓叙述凸显出来,《伤痕》改写了过去近30年小说宏大叙事的主体缺失历史。《伤痕》引领了伤痕文学个人生活叙事的潮流,伤痕文学不再提供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凡俗人等的生活悲歌取代过去的英雄赞歌成为常态。伤痕文学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生存伦理取代家国生活伦理、悲剧取代喜剧的新型叙事伦理,为之后的先锋叙事、解构叙事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伤痕》;伤痕小说;80年代;叙事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9)04-0132-05

OSID:



作为文学潮流,伤痕文学已经远去,其影响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经过时间的沉淀,它的一些过去未能被人及时察觉的新质慢慢又吸引了研究者们。有的学者在谈到卢新华的《伤痕》时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回头来看,一篇艺术上比较稚嫩,思想上也欠深刻的小说,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1]“这篇小说的本质就是个人话语对畸形的集体话语的一次成功的反动”^[2]。学者们对伤痕文学一些典型文本的重新关注显然已非其兴起时的热点话题,而是时间沉淀后的新体认,有着更为宏阔的文学史视野。“眼下‘伤痕文学’这股浪潮虽然已经相当遥远,但是今后任何一位文学史家也无法否认,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真正起点和整个新生的文学观念的最初萌动”^[3]。学者们对伤痕文学的重新关注提醒我们,隐藏于伤痕文学血泪控诉、政治诉求背后的,除了题材和审美观念等的延续性外,其所蕴含的一些新的质素应是我们予以关注的重点。而正是在叙事伦理这个最为关键的“文学节点”上,伤痕文学逸出了原有的轨道,催生出新的“文学品质”,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伦理的深刻变革。《伤痕》是这个节点上的一个典型文本,通过对它的叙事伦理分析,可以为我们更好地揭开伤痕文学叙事伦理的整体性变革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一、《伤痕》:伦理的秘密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随即引起巨大轰动。它“和之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的发表,如同平地炸响的两声春雷,引发了思想界、文学界,乃至全国民众对十年‘文革’的集体反思。……《伤痕》发表后,报社和卢新华个人收到了总共近3000封读者来信”^[4]。一篇普普通通的小说为何具有这么大的魔力,是像它的读者们所说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还是像有些学者所言在于它的政治性影响,抑或其他什么原因呢?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十分准确。《伤痕》发表前后,类似的作品并不少,但引起评论界高度关注的就这么几篇,《伤痕》即位列其中。《伤痕》讲述的故事具有普遍性,它对故事的建构却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伤痕》讲述的是当时看似普通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文革”悲剧故事:女主人公王晓华为了追求进步与“叛徒”母亲决裂,一个人偷偷下乡到临近渤海湾的一个村庄,9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拒绝母亲的任何来信。打倒四人帮后,母亲告诉王晓华自己平反的消息而王晓华不敢相信,母亲病逝时王晓华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造成终生遗憾。故事采用伤痕小说常见的叙事模式,即灾难之前—灾难降临—意外转机—脱离灾难。但正如许子东所说:“每个叙述者都以青

收稿日期:2019-05-1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17WX1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W011)

作者简介:周建华(1969—),男,江西吉安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春、伤逝、甚至死者的名义担保他们的故事的真实,但读者却分明在不同的故事中看到不同的‘文革’历史。”^[5]^[6] 作为一篇引领时代风骚的作品,在看似大同小异的悲剧控诉中,读者分明可以在《伤痕》中读出其与众不同的故事意涵,而解开这个故事意涵的密钥就在小说中几对伦理关系的处理上。《伤痕》大致勾勒了这么几对伦理关系:王晓华与母亲、王晓华与男友苏小林,这是两对显性的人伦关系;实际上还有三对隐性的人事关系,即王晓华与组织、母亲与组织、苏小林与组织。这两组五对错错综复杂的关系编织起了《伤痕》复杂的伦理架构,完成了它由“十七年”和“文革”小说之伦理叙事向新时期小说叙事伦理的转向。

《伤痕》继承了“十七年”及“文革”时期英雄传奇将革命伦理与世俗生活伦理交织,并在两者的纠缠与冲突中彰显革命英雄主义的叙事策略,将家庭亲情伦理置于革命斗争伦理的故事架构下,但又在两者冲突的裂隙中寻找到了突破的节点。在《伤痕》的故事表层,年仅 16 岁的王晓华背着母亲远赴东北,忍受 9 年多的身心煎熬,最终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未能见到,造成终生遗憾,这是一个“犯错”的孩子遭受惩罚的故事。整个受罚过程中,作者设置了几个小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入团遇挫。经过近 4 年的拉锯战,总算入了团,但她此时的心理状态已经从一颗火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第二个小环节是:因为王晓华的身份问题,男友苏小林调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事黄了,她只好“关上爱情的心窗”忍痛疏远苏小林。因为接连受挫,王晓华对自己的出身更加厌恶,内心更为敏感,心扉关得更紧了,对母亲也更为疏离。疏离的结果是,母女之间既没有生离也未能死别,王晓华旧恨未去又添新痛。这个疼痛是王晓华和母亲之间人伦之痛,是一个女儿为革命忤逆母亲导致的无可挽回的亲情难圆之痛。在革命伦理与家庭亲情伦理的二难选择中,卢新华通过王晓华人生选择故事的叙述,已经告诉了读者他的选择。但卢新华并不满足于这个,他说:“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无论‘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心头多多少少都刻下过伤痕。”他希望能够“从思想路线、理论体系上厘清‘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4]。《伤痕》要揭示的不是伤痛本身,而是探寻究竟是什么东西给王晓华留下心灵的伤痛。这个任务落在故事发展的第二条线索,即王晓华与母亲关系产生裂痕的思想逻辑上。

过去的革命伦理问题表现在王晓华与母亲的关系上,是王晓华选择哪一个“母亲”的问题,即组织母

亲与生身母亲的伦理问题。《伤痕》设置了追求进步的青年王晓华是响应党的号召与“叛徒”母亲决裂,还是继续与“叛徒”母亲为伍这一尖锐矛盾。像大多数青年一样,王晓华选择了前者。选择之前,王晓华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母亲被定为“叛徒”身份后,王晓华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接着是被迫住进了黑暗的小屋,再接下来是她红卫兵身份被撤销。在鲜明的阶级洗礼与舆论导向中,党“妈妈”战胜了生身母亲,王晓华与母亲决裂下乡渤海湾农村。令她意想不到的是,与母亲的决裂并不能洗脱她身上的“黑”颜色,不断的遇挫反而加剧了她的耻辱感、绝望感。这又进一步扩大了王晓华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裂隙,以致错失与母亲相见的最后机会。故事叙述至此,似乎沿着“决绝一怀疑一痛苦”的思想与情感线索平淡无奇地推进。但是,王晓华真正的痛苦还有一个令她无法释怀的原因,那就是 9 年多来她对母亲的决绝原来是一场“误会”。令她产生误会的是另一个“母亲”,而这个“母亲”是不会有错的。在两个“母亲”的拉锯战中,王晓华的选择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巨大张力。小说结尾,王晓华拉着小苏“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故事却没有完。

《伤痕》一扫过去革命英雄传奇文学中常见的圆满结局,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王晓华离开江边时,“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疤谁戳下的’”。王晓华没有放下心中的伤痛,清晰地看见母亲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的一条一条的伤疤,她无法忘记病危的母亲期盼与女儿相见的迫切而痛苦的心,还有那无法褪去的“颜色”给自己带来的深重精神创伤。相比同时期的《班主任》等其他伤痕小说,卢新华《伤痕》最大的特征不是以描绘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取胜,而是在那个年代里王晓华遭遇的普遍又略带个人特色的故事里,勾画出了她的悲剧心理,在组织与亲情之间如何选择的重大伦理课题面前,营构了自己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诉求。钱理群曾经感慨,“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人的心灵世界”^[6]^[72]。在这个意义上,《伤痕》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叙事伦理的出现。

所谓“叙事伦理”,是指“在叙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以‘对生命的热爱与人格的尊重’为核心的人文关怀”^[7]。它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记忆,“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

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8]4}。王晓华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鲜明个人特质的“例外情形”。卢新华在《伤痕》的创作谈中承认,“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无论‘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心头多少都刻下过伤痕。而现实中,我确实也看到或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4]。《伤痕》的惊心动魄之处不在于构建了王晓华遭受的双重精神打击,而是即使在对母亲做出绝情的选择时,王晓华也难掩内心的痛苦。她压抑住对母亲的思念,然而想起自己的一切就“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与苏小林的爱情冲淡了王晓华心头的伤痛却难掩脸上时常出现的忧郁,当她发现母亲以改换地址的方式给自己寄信时,几度想拒绝,但还是“止不住读了下去”,不敢相信母亲的话是真的,梦中却不断浮现母亲的身影。这是过去英雄传奇中少见和屡遭批判的个人主义情感。《伤痕》突破了“十七年”文学关于民族国家的革命叙事拘囿,将个体、家庭及日常引入叙事框架并作为支配性的隐性线索主导故事发展走向。王晓华最终遵从自己的生命感受,血缘伦理超越组织伦理,在“文革”甫一结束这个历史的节点上,《伤痕》的叙事令人耳目一新。

二、“伤痕”与叙事伦理的突围

如果说王晓华人生选择的血缘回归以及最后并不那么十分令人放心的表态预示着某种突破的话,那么《伤痕》之后,《我该怎么办》《重逢》《枫》《我是谁》《将军吟》和《飞天》等一个接一个伤痕故事的联袂推出则直接推动了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突围。叙事伦理学非常注重讲故事,而且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它通过叙事“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8]3}。伤痕文学讲述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个人在那个时代里的痛苦生活记忆。它编织的故事时间和空间不是个人可以依照自身意志和价值意愿自由支配的世界,而是记忆犹新、令人感慨唏嘘的梦魇过去。但是,伤痕叙事依然给人们带来了亮光,它让人重新认识了世界并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生命感觉。

漫漫长夜之后,伤痕文学率先以真情来感动读者,在真实的人物受害故事中来纾解、抚慰那些曾经受伤的心灵,给他们以温暖。“文革”给予社会最大的伤害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社会心理,是人與人之间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如何填平这个鸿沟,使温暖重归人间,抚慰那些曾经受伤的心灵是当时

最为急迫的一项工作。伤痕文学自觉担起了这个重任,它自觉地将人物受难故事作为自己书写的重心,除了《伤痕》那样以展现主人公严重心灵创伤为主的作品,不少小说还描绘了主人公的血和泪的遭遇,如在《我该怎么办》中薛子君的家破人亡、在《飞天》中飞天的屈辱和与海离子的阴阳两隔、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许茂女儿们的苦难与屈辱等。在那些作品中,主人公们的血泪很容易让有着类似经历的读者联想到自己身历或亲见的悲剧人生,激起他们对造成那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的愤怒。但与此同时,那似曾相识的影子所引发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无疑为他们长期的积郁打开了缺口。在叙事视角上,伤痕叙事多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展开,叙述者和见证人总是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来处理故事,不少段落几乎就是叙述者的心理感受和内心独白,如“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王晓华在返回上海探望母亲途中的这一段神态描写,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叙述者所感受的痛苦与忧伤。伤痕小说叙述的是一些“落魄”英雄,或单纯“英雄”的故事,他们内心有波澜、情感有忧郁,也更加注重叙事技巧的运用,在多视角多维度中传达叙述者复杂或者隐秘的内心情感。

在形式各异又似曾相识的各种人生困境中不再提供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是伤痕小说叙事伦理的另一个突围。“十七年”文艺思想的指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艺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加以估量。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9]。梁生宝、刘雨生、李双双等一批坚定地走合作化道路,一心为公的新型社会主义英雄脱颖而出,奠定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主义英雄的基本范型与道德原则。伤痕文学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十七年”文学创作的政治惯性,但已经孕育着新的质素:个体取代集体逐渐成为主要的价值取向。首先,政治不再完全正确,而且错误政治给社会、家庭及个体造成灾难;其次,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伤痕文学不再将个体命运安排置于政治正确性之下,主人公命运在看似圆满的结局中总是存在着遗憾甚或隐患。

伤痕小说与“十七年”小说和“文革”时期小说有

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即文学的真实性,但是,真实性的内涵却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有了变化。它不再是从政治正确出发,“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各个阶级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命运”,而是“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透过生活现象去揭示生活的本质,使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政治的真实统一起来”^[10]。谁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谁就获得真实的发言权。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小说中路线、阶级斗争的真实在伤痕小说中轻而易举地进行了转换甚至被消解了,主人公不再是生活中高不可攀的英雄,而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乃至实践者,他们的善良与努力不仅没有为自己挣得正常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反而加剧了自身的悲剧命运。控诉取代赞颂,过去英雄的赞歌如今成为凡俗人等的生活悲歌,伤痕文学实现了叙事伦理的第三个突围。

“文革”结束之后,作家们如何叙说他们的“文革”经验,整理他们的“文革”记忆,这不只是涉及态度问题、视角问题,也涉及叙述的方式问题。在各种形式的“文革”叙述中,小说依然是非常重要而且反响较大的一种。在类似的遭遇和文学经验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似的叙事模式,许子东将它概括为“初始情景—情景急转—意外发现—结局”的“文革”叙事模式。在这个模式的诸种类型中,又以“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5]168}与伤痕文学相契。伤痕小说中的灾难故事源于体制却并不反思体制缺陷,写出了人生悲剧却很少做人性的思考,而是将精力集中于关注人物的悲剧命运及悲剧命运制造者的政治批判与道德批判。从它们所能提供的思想的高度层面来说,伤痕小说确实不具备深远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叙事的层面上来说,尽管叙事对象仅仅着墨于受难者的悲剧人生、“四人帮”及其爪牙的丑恶行为上,但它却开了当代文学政治控诉的先河,为后来对错误政治的校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伤痕”与叙事伦理的转型

在当代文学的历史链条中,伤痕文学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学史意义?通常意义上,伤痕文学指的是“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11]540}。相比“十七年”文学,伤痕文学在题材、主题等传统领域里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并且在价值立场选择、叙事技巧运用等方面有新异的表现,成为开启当代个体生存伦理叙事取代家国生存伦理叙事的先声。在故事伦理层面上,伤痕小说实现了叙事话语、思想承载及伦理价

值三个方向的转型。“伤痕”文学之前,小说叙事话语创作总体上是一种革命话语。从伤痕文学始,人道主义话语重新进入作家视野,小说从专注于英雄形象的塑造转移到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为他们遭受极“左”政治的捉弄而痛苦。“小流氓”宋宝琦、四姑娘许秀云、知青娟娟等都是小人物,他们有别于梁生宝这样的英雄,他们命运的多舛或生命的毁灭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让读者意识到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可贵。《过把瘾就死》《顽主》《我的帝王生涯》《现实一种》及《废都》等一改过去习惯,表达对“历史”的终结,自觉疏离“宏大”题材,躲避崇高。它们超越了伤痕小说个体生活叙述的情绪化流弊,蕴含着更多的生存意义上的思考,推动了叙事伦理的深层次发展。

伦理价值方面,故事伦理的家国导向被对个体生存与生活的关注所取代。在这个向度上,《伤痕》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王晓华在火车上的痛苦回忆、想跟妈妈道歉而不能的心理描写带给读者的震撼力,远远超越了故事末尾王晓华那个“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的身影。显然,在王晓华难以压抑的“积愤”与南京路的“灯火通明”之间,文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裂隙。这个裂隙为先锋小说率先抓住,它以“一种充满创造欲望的前卫艺术姿态……表现着对既成社会规范和艺术传统的叛逆或超越企图”^{[12]221}。马原以“马原的叙事圈套”玩着“文字游戏”,赵毅衡却在他的作品中分明感觉到“鬼气森然”的“文革”影子。余华和苏童等则以《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及《我的帝王生涯》等“发言玄远”的小说表达他们对荒诞世界的拒斥与批判。在“回到文学自身”“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等观念影响下,先锋文学开启了反主体、反权威、反历史的与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个体化指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等因素的影响下,“文学作品和文学写作的商品性质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13]387},作家们基本不再将写作视为一种精神承担,不喜欢再做读者的精神导师,而是习惯于在爱河欲海中展现人物的爱与恨、欲望与禁忌、欢乐与痛苦。

故事叙述层面,伤痕小说也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的变革。《伤痕》给予了我们这方面充分的信息。它叙述的是女知青王晓华疏离母亲、回归母亲、伤别母亲的悲情故事,在众多的伤痕故事中它并不十分特别,但它的叙事却具有代表性。为了加强故事的悲剧性,作者运用了一些小技巧。首先,它采用了倒叙的方法。小说开篇,通过在朦胧、温馨的春天里王晓华在闪闪泪光中对往事的痛苦回忆制造不和

谐的异常氛围,定下小说整体的情感基调。其次,加大了描写的力度,通过场景描写强化情感的逼真性和导向性。例如小说第6段对小女孩的梦境描写,“妈妈”的呓语刺激了王晓华别母伤母的内心剧痛。再次,叙述者的主观介入性叙事。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这原本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叙述视角,但叙述者深入到王晓华的内心世界,想王晓华所想,痛王晓华所痛,与场景描写一起营造了文本浓郁的感伤氛围。

从王晓华时代性的生活遭遇到庄之蝶(《废都》)个体私生活的混乱,从通过王晓华个人遭遇反映一个时代的灾难到凝视庄之蝶等知识分子个体生存状态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关注个体生存的叙事伦理越来越强大,既有的家国叙事伦理似乎越来越边缘化,仅仅在那些新红色经典叙事中是一种醒目的存在。但是,无论是前进还是退却,这两种叙事伦理却始终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也许正是长期以来家国叙事伦理的支配性存在,才促成了伤痕小说个体生存叙事伦理的意外突围。然而,事情的发展又往往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当个体生存叙事伦理以先进者的姿态否定和排斥家国叙事伦理的时候,它自己本身可能已经沦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工具。正如意大利美学家艾柯所说:“对意义的探索过程亦即发现二项对立的过程,事实上在哪儿发现二项对立就在哪儿掉入了意识形态之中。”^[2] 矫枉过正必然引起反弹,况且家国叙事伦理从来就没有从小说叙事中退却。从《狼图腾》到《天高地厚》、从《蛙》到《炸裂志》,当我们静下心来打量新世纪小说时,已经很难简单地对它们做出区分,哪部是表现个体生存叙事伦理的,哪部主要是家国伦理叙事的。抛开政治话语拘

囿和意识形态化解读,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一部小说的叙事魅力,这也许是伤痕文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所做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丁东,谢泳.重说卢新华《伤痕》的意义[N].中国青年报,2004-09-01(B2).
- [2] 贺桂梅.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J].文艺争鸣,1994(1):17-20.
- [3] 李洁非,张陵.被唤醒的美学意识[J].文学评论,1986(2):92-99.
- [4] 倪自放.卢新华讲述《伤痕》出炉的幕后故事[N].齐鲁晚报,2008-11-23(A03).
- [5]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6] 钱理群.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7] 徐岱.叙事伦理若干问题[J].美育学刊,2013(6):31-46.
- [8]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经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9]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人民文学,1953(11):7-20.
- [10] 刘心武.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N].光明日报,1978-10-03(04).
- [11] 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7.
- [12] 王嘉良,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 [1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The Wound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vel Narrative Ethics since the 1980s

ZHOU Jian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As a literary trend, the Wounded Literature is long gone, but its influence is far from gone. The Wounded is one of the iconic works of the Scar Literature, and its influence is profound. The impact of The Wounded lies not in its "wounded" description, but in the narrative ethics it pioneered. The Wounded narrates the difficult choice between Wang Xiaohua's organization and his mother and the serious mental bruise it brings. This mental bruise highlights through the narration of Wang Xiaohua's personal life and rewrites the history of the lack of subject in the grand narrative of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Wounded leads the trend of personal life narration in wounded literature. The Wounded Literature no longer provides common collectivism moral principles, such as common people life elegy praise to replace the past heroes becomes the norm. It opens a new type of narrative ethics such as the individual survival ethics to replace the country's life ethics, tragedy instead of comedy since the 1980s, paving the way for Vanguard narrative and deconstructs narrative.

Key words: The Wounded; The Wounded Literature; the 1980s; narrative ethics

(责任编辑:韩大强)